

融资约束视角下 非公有企业的“党建红利”

尹智超 彭红枫 肖祖沔 王 营*

摘要: 抓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融资约束视角发现了非公有企业的“党建红利”,即开展党建工作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贷款。其中蕴含两个层面的理论机制,一是增信效应缓解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二是资源配置效应使企业享受更多政策福利。此外,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党建工作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更强,并且有助于缓解银行对企业的融资歧视。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主观认同感和党建积极性有指导意义,有助于实现党组织的柔性嵌入。

关键词: 非公有制企业;融资约束;党组织建设;党建红利

一、引言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基层党组织建设一直是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中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实现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全覆盖。党的十八大以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探索革新,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效,不断涌现出一批党建强、发展好、社会形象佳的非公有制企业先进典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何轩和马骏(2018)基于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研究发现,截至2012年,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占调查样本的30.8%。从非公有制企业自身角度来说,它们作为高度依赖市场交换的经济主体,开展党建工作除了提升政治理论素养之外,似乎难以产生可以观测到的经济效用,这可能是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建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市场的激烈竞争与生存压力使企业无暇他顾,特别是一些存在经营困难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遭遇银行抽贷、断贷,融资

* 尹智超,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50014,电子信箱:yzcyzc210@126.com;彭红枫,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50014,电子信箱:fhpeng@whu.edu.cn;肖祖沔,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50014,电子信箱:xiaozumian@sdufe.edu.cn;王营,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50014,电子信箱:wangying1778@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资本市场重大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项目编号:19ZDA06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高管同群现象及其决策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1802116)、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山东实体经济效率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DGLJ12)的资助。感谢《经济评论》编辑部开放日·审稿快线第5期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为了缓解融资难题、获取更多外部资源,企业主过度寄希望于谋求个人政治身份来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企业自身基层党建工作则亟待加强。

我们不禁思考,企业的党组织建设除了政治引领作用外,能否为企业带来可以观测到的“党建红利”?如何找到一个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积极性的契合点,将党建工作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有机结合,增强企业党建工作的积极性?本文将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制约企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的角度,探讨党组织建设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找到二者的逻辑关联,为激励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也在货币财政政策之外为政府部门找到一个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潜在路径。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三点边际贡献:一是丰富了关于“组织嵌入”理论的研究。“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是政企关联的两个主要途径,但是“组织嵌入”相较于“政治吸纳”而言,因党建数据可得性等原因,很多研究将其“互为替代”或“混为一谈”,真正做出区分的不多。本文系统性整理了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数据,从而克服了数据上的困难,区分了“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并阐述了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对企业发展的意义。二是将政企关系的研究对象从公有制经济转向非公有制经济,从企业主或管理层政治背景转向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等公有制经济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学界关于党组织嵌入效果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更侧重于国有企业,而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研究则更多地聚焦于企业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个人政治身份对企业的影响,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的研究有待深入。三是试图从缓解融资约束的视角为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找到“党建红利”,并进行量化分析,从而有助于激发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本文余下的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评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述评

(一) 政企关系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

融资约束是指资本市场摩擦导致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对于非公有制企业而言,造成融资约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企业外部融资存在信息不对称。苟琴等(2014)指出,融资约束的产生更多与企业自身禀赋有关,企业属性并不是决定因素。银企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银行出现“惜贷”现象,控制对一些信用信息不详的企业提供贷款(屈文洲等,2011)。二是部分中小企业可抵押资产价值低,难以达到银行的融资要求。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资金实力较弱、生产规模较小、财务报表缺乏可信度,金融机构无法准确地识别出企业潜在风险(吕劲松,2015)。尽管政策倾向于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上述两个原因环环相扣,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加大了企业的融资难度。

为突破内外部环境形成的融资约束,不少企业主、高管试图将政治资源导入企业内部,降低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门槛(蒲勇健、韦琦,2020)。在中国,“政治吸纳”和“组织嵌入”是政企结合的主要路径,这对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有重要意义(彭勃、邵春霞,2012)。对于企业主而言,他们多是希望通过政治吸纳谋求额外的关注与保护,获取资源分配、产权契约、政策扶持、行业准入等(李宏亮、谢建国,2020)。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规则的重要性在上升,党组织嵌入变得愈发重要。组织嵌入理论认为,由于组织禀赋和政治使命的要求,执政党运用基层组织嵌入社会的方式,获得

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彭勃、邵春霞,2012)。党组织嵌入企业后,企业主更容易在思想上向党组织靠拢,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性,提高党性觉悟,减少寻租腐败等短视行为,转而注重增加生产和创新,并整合企业优秀人才资源参与到企业的改革和生产经营中。何轩和马骏(2016)研究发现,设立了党组织的企业主将产生更良好的制度环境感知,对企业行为具有纠偏的作用。党组织建设工作与非公有制企业融合,“组织嵌入”与“政治吸纳”互相补充,共同推进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党组织嵌入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性,也是党领导社会的重要方式。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是以促进生产关系协调发展为重点、调动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促进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维护党的领导(何轩、马骏,2016)。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党组织与政府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对各项政策法规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党组织利用组织资源优势,及时、准确地将外部环境的有效信息传递给企业主,减少他们对制度环境的误判(毛志宏、魏延鹏,2020)。二是公有制经济党建制度的完善和成熟为非公有制经济创新党建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基层党建制度有利于将党建工作合理嵌入企业,确保企业在经营和参与竞争过程中,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弱化外部风险对企业的不利影响(李明辉、程海艳,2020)。三是党组织的存在有助于维护企业生存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尤其在劳资关系方面确保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调动生产者、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董志强、魏下海,2018)。

(三)对既有文献的评述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资源。既有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条件下,非公有制企业的政治背景能为企业融资带来更多优势。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主群体已经开始出现更新换代,职业经理人文化也逐渐被接纳,市场化程度和经营环境不能同日而语(余澳等,2020)。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强力正风反腐,我国的政商关系也在因时而变,企业党组织建设成为引领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另外,既有研究准确归纳出了“政治吸纳”和“组织嵌入”两个政企关联路径,但是前者相较于后者而言,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关于组织嵌入的研究,要么通过高管党员身份代替,要么仅仅围绕国有企业样本展开,聚焦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的研究比较缺乏。这既源于学界对非公有制经济党建研究重视度不够,也源于相关信息披露较少、较难统计,导致学术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很难实现定量分析。基于此,本文以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数据,从融资约束这一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堵点,阐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找到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发展的契合点,激发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受资源约束影响,企业单凭一己之力往往难以聚合价值资源,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协同价值主体提高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Amit and Schoemaker,1993)。特别是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企业主更倾向于寻求政企关联以获取资源、银行贷款和司

法保护。此外,还有学者将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股权作为一种政企关联方式,发现这也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贷款(余汉等,2017)。

随着“亲”“清”政商关系的形成,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制度环境正在优化,政商关系的基本逻辑向制度化的“多元主体共治”转变(邱观建、付佳迪,2016)。随着企业主开始运用制度化和组织化方式协助执政党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和市场化改革,其经营策略更为长远,对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性的经营活动的偏好性增强,而这将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何轩、马骏,2016)。严斌剑和万安泽(2020)研究发现,企业设立党组织可以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等生产资料。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对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获得银行贷款的增加。

(二)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

1. 增信效应

稳健的经营和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将对企业获得更多贷款有积极作用。然而,企业经营风险与管理层个人特质有关,代理问题容易造成管理层更为激进,并可能导致企业重大损失,进而给银行带来潜在的贷款损失(Cohen et al., 2013)。从政府角度看,他们不希望企业承担过高的风险,否则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不利(李文贵、余明桂,2012)。而企业党组织对于公司治理水平(马连福等,2012)、企业资产安全(陈仕华、卢昌崇,2014)、企业社会责任(王舒扬等,2019)都有提升作用。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现状会通过其向外界提供的信息传递出来。企业党组织建设能够提高企业文化氛围、思想层次,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李姝、谢晓嫣,2014)。对于一个重视社会责任的公司而言,经理人出于职业道德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考虑,会约束自身投机行为。Kim等(2012)的研究表明,外部投资者通常会利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决策,这能够使管理层在伦理责任和机会主义之间进行权衡,抑制道德风险。戴亦一等(2017)认为,设立党组织是用共产主义价值观规范公司治理的一条渠道,党组织通过对党员高管的约束,降低企业财务造假风险。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发现企业党组织能够提升董事会治理水平,显著降低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在“政企关联效应”之外,景麟德等(2018)基于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概括出了“信息释放效应”,即出于对政治组织的信赖,银行对这些企业的贷款违约预期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从而愿意为企业提供更多贷款。可见,资金供求双方在企业经营状态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较为普遍的逆向选择问题,无疑是妨碍企业融资的重要因素。党组织的存在会约束企业行为,提高企业披露信息的规范性和真实性,向外界发出企业经营稳定、注重声誉的信息,从而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于此,本文将之界定为增信效应,并提出关于开展党建工作与非公有制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假设:

H2: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有助于提高银行对企业的信任,表现为企业信用水平的上升,获得更多信用贷款。

2. 资源配置效应

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基层党组织有别于以法人身份管理企业的国有企业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发挥的是一种间接作用,体现在政策引导与协调、企业文化建设、思想引

领与统战等方面(郑长忠,2019)。此外,基层党组织还能帮助企业主及时了解和把握最新政策动向、化解政策误判风险(李健、郭薇,2017),这些优势都会使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获得更多便利。党组织嵌入企业中,能够更好地充当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沟通渠道(何轩、马骏,2018),有利于企业获得税收优惠、政策补贴、融资便利等。基于此,本文将之界定为资源配置效应,并提出如下机制假设:

H3: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有助于企业及时了解政府扶持政策,获得更多政策补贴或贷款优惠。

四、研究设计

(一)多时点 DID 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企业是否拥有党组织以及建立党组织的时间点,考察企业是否开展了党建工作。考虑到不同企业设立党组织的时间并不一致,本文构建了多时点 DID 模型,以解决个体的处理期时间点不完全一致的问题。模型如下所示:

$$y_{i,t+1} = \alpha + \mu_i + \lambda_t + \theta did_{it}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1)式中: $y_{i,t+1}$ 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融资约束变量,考虑到开展党建工作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有一定时滞性,因此在模型回归中,被解释变量选择 $t+1$ 期。 did_{it} 表示因个体而异的处理期虚拟变量,为企业是否有党组织($treat$)及党组织成立日期($post$)的交乘项。在虚拟变量赋值上,若个体 i 在第 t 期接受处理, did_{it} 进入处理期,此后时期均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λ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x_{i,t}$ 为控制变量, β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 $\varepsilon_{i,t}$ 为模型误差项。在上述设定之下,交乘项的系数 θ 即表示处理组前后变化与控制组前后变化之差,即平均处理效应:

$$\begin{aligned} \theta &= \{E[y_{i,t+1} | treat_i = 1, post_{i,t} = 1] - E[y_{i,t+1} | treat_i = 1, post_{i,t} = 0]\} - \\ &\quad \{E[y_{i,t+1} | treat_i = 0, post_{i,t} = 1] - E[y_{i,t+1} | treat_i = 0, post_{i,t} = 0]\} \\ &= (\theta + \lambda_t) - \lambda_t = (\theta + \mu_i) - \mu_i \end{aligned} \quad (2)$$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党组织虚拟变量 did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详实性,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市场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可得性较差的样本以及金融保险企业,共获得样本企业1836家。本文团队通过上市公司年报、官方网站、互联网新闻等公开资料检索“党委”“党支部”“党建”“党组织”等关键词,辅之电话咨询,整理了这些企业是否有党组织及党组织成立时间数据。样本中明确设有党组织的企业573家,包括设立党委的大型企业436家和仅有党支部的小型企业137家。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是否起到了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为了验证假设H1,本文选取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lnal$)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替代变量,如果企业在组建党组织后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意味着党建工作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成立。同时,为了体现贷款的期限结构特征,我们区分了短期贷款($lnsl$)和长期贷款($lnll$)。

为了实现对H2和H3的机制检验,还需要设置用于机制检验的被解释变量。为了检验假设H2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增信效应,我们以企业信用借款比例(xlr)、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上限($lnlup$)、业界评估机构给出的信用评级($credit$)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信用借款比例(xlr)可以评估企业党建对企业信用借款的影响;银行贷款上限($lnlup$)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银行对企业信用的态度,用于解释企业党建对最高贷款额度的影响;业

界评估机构披露的企业信用评级 (*credit*)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市场对企业信用水平的看法,是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参考指标。

为了验证假设 H3 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政府资源配置效应,我们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 (*lngs*)、贷款利率 (*lir*) 和贷款利率是否下浮 (*rdown*)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这些变量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是否及时享受到了政府的相关优惠、扶持政策,从而检验党组织能否将党中央扶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信息和资源导入企业,发挥服务型党组织的作用。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参考既有文献选取了财务杠杆 (*lev*)、总资产净利润率 (*rtar*)、经营性现金流 (*cfo*)、企业规模 (*lnast*)、营运资本配置比率 (*wcr*)、销售利润率 (*ros*) 等变量,这些变量基本涵盖了企业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等影响企业融资的关键因素。此外,本文强调党组织建设的影响,即“组织嵌入”的影响,因此需要控制“政治吸纳”因素。为此,本文设置了两个“政治吸纳”控制变量:一是选取管理层党员占比 (*member*) 控制管理层党员身份,二是选取管理层政府任职经历控制政企关联因素 (*association*),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其中任意一人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那么政企关联取值为 1,否则为 0。

变量的定义与数据来源详见表 1,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2。

表 1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及符号	变量描述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贷款总规模 (<i>lnal</i>)	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总规模对数值	企业年报、Wind 数据库
	短期贷款规模 (<i>lnsl</i>)	企业从银行获得的短期贷款总规模对数值	
	长期贷款规模 (<i>lnll</i>)	企业从银行获得的长期贷款总规模对数值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有党组织 (<i>treat</i>)	企业有党组织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作者整理
	成立党组织时间 (<i>post</i>)	成立党组织年份及以后赋值为 1, 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财务杠杆 (<i>lev</i>)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企业年报、Wind 数据库、CSMAR 数据库
	总资产净利润率 (<i>rtar</i>)	当期净利润除以期初总资产	
	经营性现金流 (<i>cfo</i>)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占期初总资产比率	
	企业规模 (<i>lnast</i>)	企业总资产对数值	
	营运资本配置比率 (<i>wcr</i>)	企业营运资本占流动资产比率	
	销售利润率 (<i>ros</i>)	企业利润与销售额的比率	
	管理层党员占比 (<i>member</i>)	管理层党员占管理层总人数的比重	
政企关联因素 (<i>association</i>)	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其中任意一人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机制检验变量	信用借款比例 (<i>xlr</i>)	企业信用借款占总贷款的比重	CSMAR 数据库
	银行贷款上限 (<i>lnlup</i>)	企业能够获得的银行贷款上限对数值	
	政府补贴 (<i>lngs</i>)	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对数值	
	贷款利率 (<i>lir</i>)	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水平	
	贷款利率是否下浮 (<i>rdown</i>)	企业的贷款利率下浮为 1, 否则为 0	
	信用评级 (<i>credit</i>) ^①	业界评估机构的信用评级 (<i>credit</i>)	网络爬取

注:取对数的变量原始单位为百万元。实际回归过程中,*treat* 与 *post* 构成交乘项 *did*。

① *credit* 数据处理过程:首先,使用网络爬虫获取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网站关于部分企业评级的结果;其次,将评级结果分类得到 AAA、AA+、AA、AA-、A+、A、A-、BBB+、BBB、BBB-、BB+、BB、BB-、B、B-、CCC、CC、C 十八个级别;最后,以 AAA 为 100 分,各等级依次减 5 分的方式进行等级评分。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nal</i>	7 204	19.270	1.874	10.175	25.343	<i>ros</i>	9 147	0.216	43.511	-1.118	0.895
<i>lnsl</i>	6 797	19.001	1.732	7.114	24.586	<i>member</i>	9 263	0.274	21.301	0.018	0.795
<i>lnll</i>	3 873	18.493	1.950	9.424	24.921	<i>association</i>	12 232	0.370	0.483	0	1
<i>treat</i>	14 250	0.114	0.318	0	1	<i>xlr</i>	3 872	0.351	22.343	0.003	1
<i>post</i>	14 250	0.075	0.263	0	1	<i>lnlup</i>	4 925	19.079	1.456	15.520	22.803
<i>lev</i>	12 903	0.369	0.184	0.044	0.840	<i>lngs</i>	11 835	0.115	0.182	0	3.079
<i>rtar</i>	12 859	0.130	11.960	-0.077	0.592	<i>lir</i>	1 962	0.049	0.757	0.044	0.066
<i>cfo</i>	11 497	0.075	9.954	0.024	0.486	<i>rdown</i>	1 690	0.083	0.277	0	1
<i>lnast</i>	12 896	10.001	14.689	2.250	64.570	<i>credit</i>	1 538	82.939	5.647	75	100
<i>wcr</i>	12 902	0.313	0.235	0.288	8.38						

五、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

我们对企业党组织建设与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进行了多时点 DID 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企业党组织建设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

变量	<i>lnal</i>	<i>lnsl</i>	<i>lnll</i>
<i>did</i>	0.3887** (2.2355)	0.6018*** (3.4442)	0.3042* (1.6217)
<i>lev</i>	-1.4153*** (-5.9333)	-0.8352*** (-3.4565)	-5.1668*** (-15.6706)
<i>rtar</i>	0.0031** (2.5058)	0.0021* (1.7232)	0.0011 (1.4596)
<i>cfo</i>	0.0033*** (3.3125)	0.0029*** (2.8487)	0.0043*** (4.4105)
<i>wcr</i>	1.5390*** (8.9935)	1.5619*** (8.9729)	0.7355*** (3.1210)
<i>lnast</i>	0.0026 (0.5750)	0.0446 (0.7786)	0.0039 (0.7501)
<i>member</i>	0.0047*** (4.0624)	0.0038*** (3.3606)	-0.0015 (-0.8372)
<i>ros</i>	0.0028* (1.6827)	0.0020 (1.2228)	0.0034 (1.6434)
<i>association</i>	0.1457** (2.5629)	0.1397** (2.4799)	0.2181*** (2.7484)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19.2313*** (137.7461)	19.1696*** (135.4990)	16.0856*** (83.0704)
N	4 789	4 548	3 107
adj. R ²	0.1849	0.2232	0.2017

注:括号内为 *t* 值; *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下同。

分析表 3 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被解释变量为总贷款规模(*lnal*)的 *did* 系数在 5% 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开展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贷款,起到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从贷款的期限结构来看,我们进一步将贷款规模细分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不难发现,短期贷款规模(*lnsl*)的 *did* 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

著为正;长期贷款规模($\ln ll$)的 did 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综合实证结果,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假设 H1 得以验证。

这一结论初步表明,除了企业主政治身份这种“政治吸纳”渠道外,开展党建工作这种“组织嵌入”渠道,也能为企业带来潜在的收益。企业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在提升企业思想道德境界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这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 机制检验

1. 增信效应

一般来说,银行为企业提供授信额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企业需要多少钱”“企业能还多少钱”“还不上能赔多少钱”。虽然抵押资产能够降低违约损失率,但不乏一些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短、企业主目光短视缺乏诚信的现象,导致银行贷款的回收率不高。企业信用不充分、银企信息不对称致使银行对其提供贷款更看重资产状况、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等指标,忽略企业信用。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倾向于对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设置贷款约束,表现为缩减信用规模,对无抵押的信用贷款设定贷款额度限制。一般来说,资质较好的企业能够获得较高额度的贷款,资质不足的企业获取贷款的额度低,甚至可能无法成功申请到贷款。

为了检验假设 H2 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增信效应,本文以企业信用借款比例(xlr)、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上限($\ln lup$)、信用评级($credit$)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增信效应

变量	xlr	$\ln lup$	$credit$
did	0.0812 [*] (1.8480)	0.8086 ^{***} (3.1754)	0.0853 [*] (1.6598)
lev	-0.1776 ^{**} (-2.3515)	-0.4914 (-1.3244)	-4.3541 ^{**} (-1.9808)
$rtar$	0.0002 (0.7236)	0.0015 (0.7785)	0.0001 (0.0110)
cfo	-0.0004 (-0.7157)	-0.0017 (-1.1421)	0.0005 (0.0825)
wcr	0.2011 ^{***} (3.6446)	1.0051 ^{***} (3.7737)	3.0664 ^{**} (2.0582)
$\ln ast$	-0.0058 (-0.1308)	0.0786 ^{**} (2.4301)	-0.0144 (-0.1818)
$member$	0.0006 [*] (1.6532)	0.0019 (1.0939)	-0.0141 (-1.1302)
ros	0.0003 (0.5128)	-0.0049 (-1.2870)	0.0081 (0.4813)
$association$	0.0521 ^{***} (3.2577)	-0.0312 (-0.3610)	0.4734 (0.9066)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0.4115 ^{***} (9.4033)	19.2264 ^{***} (90.0360)	-89.7991 ^{***} (-70.5715)
N	2 776	3 958	1 416
adj. R^2	0.4131	0.4386	0.3588

分析表4可以发现, did 对信用借款比例(xlr)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正;对银行贷款上限($lnlup$)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正;对企业信用评级($credit$)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正。综合信用借款比例、贷款上限和信用评级水平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对企业信用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信用借款的比例会因企业开展党建工作而提高,贷款金额上限和市场对企业的信用评级也会在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后有显著提升,假设 H2 得以验证。这进一步表明,党组织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信用背书”,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诚信可靠的信息。在企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这种信息能够提升外界对企业信用的认同感,这对于企业信用融资有积极作用。

2. 资源配置效应

一直以来,党中央鼓励商业银行对诚信经营、发展前景好、产品适销对路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优惠利率支持,但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为此,党中央多次出台政策扶助非公有制企业融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形成了以财政出资为主的多元化资金补充机制,货币政策部门亦常态化开展定向降准降息,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虽然党中央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只有企业及时了解 and 掌握这些政策动向,才能够高效地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构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通过政策宣讲使企业主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及时和全面地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准确把握企业发展方向。进而,基层党组织发挥其服务职能,帮助企业将相关申报材料及时准备到位并递送相关部门进行政策申报,在助力企业争取到各项优惠政策的同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为了验证假设 H3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政府资源配置效应,我们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lngs$)、贷款利率(lir)和贷款利率是否下浮($rdown$)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分析实证结果不难发现,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对上述被解释变量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 did 对政府补贴($lngs$)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正;对贷款利率(lir)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负;对虚拟变量 $rdown$ 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更低的融资成本,也会使更多的企业享受到贷款利率下浮的优惠政策。

这进一步表明,企业党建工作能够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企业开展党建工作,通过发挥党组织服务职能,及时充分地了解党中央最新政策。一方面,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这既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可用资金,也是党和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认同,进而有助于企业在外部融资过程中提升信用水平;另一方面,开展党建工作后,企业贷款成本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党建工作能够及时传达党和政府关于扶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获得最新的融资优惠信息,进而在向银行贷款过程中争取到更为优惠的利率水平。假设 H3 得以验证。

表 5 企业党组织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

变量	lngs	lir	rdown
<i>did</i>	0.1311 *** (7.2688)	-0.1839 *** (-5.0117)	0.6436 * (1.6917)
<i>lev</i>	-0.1068 *** (-4.1531)	-0.1121 ** (-1.9797)	-7.3844 *** (-2.6769)
<i>rtar</i>	0.0003 *** (3.6506)	-0.0004 (-1.5863)	-0.0193 (-0.5268)
<i>cfo</i>	0.0004 *** (3.5765)	0.0004 *** (2.6349)	0.1118 * (1.7059)
<i>wcr</i>	0.0578 *** (3.2316)	0.2736 *** (6.9470)	2.1210 (1.3229)
<i>lnast</i>	0.0265 *** (3.8336)	0.0266 ** (2.2368)	-4.4214 (-1.5709)
<i>member</i>	0.0005 *** (4.5736)	-0.0003 (-1.3618)	-0.0295 (-1.3460)
<i>ros</i>	0.0001 (0.5705)	-0.0008 (-0.8978)	-0.0414 (-0.6267)
<i>association</i>	-0.0011 (-0.1805)	0.0126 (0.9723)	-0.1051 (-0.1099)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no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0.0946 *** (6.5003)	1.6380 *** (51.7438)	0.5472 (0.4133)
N	6 009	1 490	1 473
adj. R^2	0.2441	0.6760	0.2502

注:rdown 为虚拟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是否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前述研究得出了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的结论。影响本文基本结论的关键环节是被解释变量的选取、模型的设定,以及样本选择方面可能产生的偏差。为此,本文将从上述三个方面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

1. 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了影响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相关变量作为融资约束替代变量,选取这些变量的原因是考虑到我国大部分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并且部分中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这些变量得出的研究结论可以较好地覆盖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但是,本文选取的样本为上市企业,这些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市场直接融资,围绕银行贷款选取的融资约束指标有失偏颇。并且,一些企业本身现金流较为充裕,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少,其获得的贷款少并不意味着存在融资约束。因此,以银行贷款约束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稳健,就需要进一步验证。

为此,本文借鉴 Whited 和 Wu(2006)、Hadlock 和 Pierce(2010)构建的企业融资约束计算方程,分别构建了衡量融资约束的综合性指标 *WW* 指标和 *HP* 指标。其中,*WW* 指标根据 Whited 和 Wu(2006)给出各指标系数计算得到。该指标综合了企业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分红情况、长期负债与总资产比值、总资产规模、企业所处行业的销售增长率、企业的销售增长率。*WW* 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HP* 指标为 Hadlock 和 Pierce(2010)采用 KZ 模型,先根据企业的财务报告定性地划分企业不同的融资约束类型,再使用

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两个随时间变化不大且具有很强外生性的变量构建而成。本文的 *HP* 指标根据其系数直接计算得到,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计算 *WW* 指标和 *HP* 指标的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WW* 指标和 *HP* 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 6 所示,以此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表 7 表明,*WW* 指标的 *did* 系数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负;*HP* 指标的 *did* 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开展党建工作能够使非公有制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下降,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6 WW 和 HP 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HP</i> 指标	10 649	4.090	1.157	1.279	6.911
<i>WW</i> 指标	9 141	-0.928	0.224	-1.192	0.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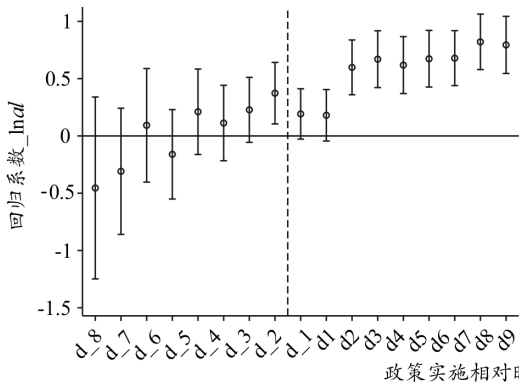
表 7 更换融资约束指标的回归结果

变量	<i>WW</i> 指标	<i>HP</i> 指标
<i>did</i>	-0.0095** (-2.4789)	-0.0165*** (-2.7794)
控制变量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常数项	-0.9664*** (-190.8077)	-3.5540*** (-389.0514)
N	6 390	6 385
adj. <i>R</i> ²	0.1827	0.7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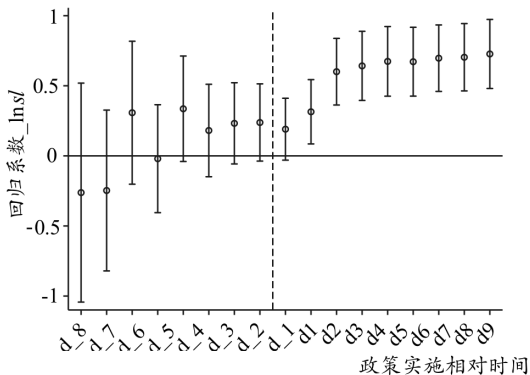
2. DID 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时点前具有一致的平行趋势。考虑到各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时间不同,本文构建了多时点 DID 模型。多个时间节点信息的出现,使我们可以对样本组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趋势进行观察。图 1 展示了本文三个主要被解释变量总贷款规模(*lnal*)、短期贷款规模(*lnsl*)和长期贷款规模(*lnll*)的平行趋势特征,图中横轴表示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前后的时间,虚线左侧为企业开展党建工作之前的年份,虚线右侧为企业开展党建工作之后的年份,纵轴为回归系数数值,置信区间为 95%。



(a) 总贷款规模平行趋势



(b) 短期贷款规模平行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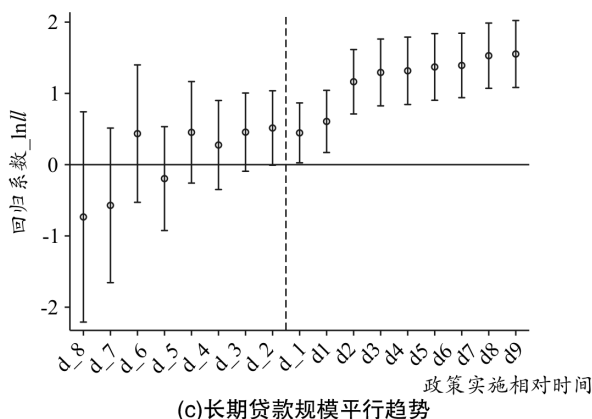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图(95%置信区间)

分析图 1 可以发现,党建之前的年份,估计值在 95%置信区间包含 0;党建之后的年份,估计值在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开展党建之前系数不显著,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在安慰剂检验方面,本文将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时间点前置两年,构造 *didnew* 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分析表 8 可以发现,虚构方式下的 *didnew* 系数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本文前述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即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与开展党建工作显著相关。

表 8 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	<i>lnal</i>	<i>lnsl</i>	<i>lnll</i>
<i>didnew</i>	0.0427 (0.2730)	0.1949 (1.2332)	0.2498 (0.8454)
<i>lev</i>	-4.9879*** (-22.7877)	-3.3416*** (-14.7826)	-7.8540*** (-18.5907)
<i>rtar</i>	0.0022 (0.8292)	-0.0014 (-0.5269)	-0.0005 (-0.1040)
<i>cfo</i>	0.0105*** (3.0519)	0.0116*** (3.2694)	0.0230*** (3.4677)
<i>wcr</i>	1.4742*** (8.8561)	2.0035*** (11.6264)	3.4418*** (10.6869)
<i>lnast</i>	0.2260 (1.1820)	0.2947 (1.4523)	0.5041 (1.3294)
<i>member</i>	0.0020* (1.8895)	0.0023** (2.0953)	0.0038* (1.8682)
<i>ros</i>	0.0002 (1.5875)	0.0001 (1.1455)	0.0003 (1.5299)
<i>association</i>	-0.1031** (-2.0799)	-0.1400*** (-2.7755)	-0.2819*** (-2.9914)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17.2918*** (125.2306)	17.8346*** (125.6290)	35.3518*** (133.2425)
N	4 963	4 716	4 716
adj. R^2	0.2172	0.1195	0.1916

3. 样本选择的稳健性检验

(1) 区分无政企关联和有政企关联企业的检验

前述分析中所使用的企业样本,有的存在政企关联,有的不存在政企关联,虽然控制了政企关联变量,但是要考察党组织的存在是否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必要将无政企关联的企业单独进行分析,从而排除政企关联因素的影响,突出党组织的作用效果。因此,本文进一步区分了无政企关联和有政企关联两种企业类型,分别进行回归并做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无政企关联和有政企关联企业的检验结果

变量	无政企关联的企业			有政企关联的企业		
	lnal	lnsl	lnll	lnal	lnsl	lnll
<i>did</i>	0.4863 *** (3.9562)	0.6278 *** (5.2104)	0.5400 *** (3.1042)	0.4183 ** (2.5082)	0.3344 ** (1.9659)	0.3405 * (1.6449)
<i>lev</i>	-2.8354 *** (-12.3848)	-2.0082 *** (-8.8164)	-2.3645 *** (-6.9775)	-3.2000 *** (-10.6268)	-2.1865 *** (-7.1004)	-5.3051 *** (-12.6001)
<i>rtar</i>	0.0047 *** (3.9902)	0.0031 *** (2.7258)	0.0048 *** (3.0592)	0.0095 *** (4.1957)	0.0071 *** (3.1784)	0.0063 ** (2.0474)
<i>efo</i>	0.0051 *** (3.2223)	0.0056 *** (3.4334)	-0.0006 (-0.2869)	0.0026 ** (2.2169)	0.0016 (1.3352)	-0.0011 (-0.8007)
<i>wcr</i>	1.2874 *** (7.4744)	1.4049 *** (8.1645)	0.5332 ** (2.0265)	1.1930 *** (5.2076)	1.4249 *** (6.0865)	1.0152 *** (3.2034)
<i>lnast</i>	0.0077 (0.3608)	0.0306 (0.5227)	0.0214 (0.8501)	0.0028 (0.4101)	0.2986 ** (2.0072)	0.0032 (0.3875)
<i>member</i>	0.0054 *** (4.3737)	0.0046 *** (3.8846)	0.0056 *** (2.7961)	0.0066 *** (3.9156)	0.0043 ** (2.5316)	0.0070 *** (2.8080)
<i>ros</i>	0.0024 (1.3744)	0.0025 (1.4649)	0.0027 (1.1520)	0.0020 (0.6446)	0.0025 (0.8221)	0.0024 (0.6209)
<i>association</i>	no	no	no	17.7334 *** (84.3511)	18.0407 *** (84.3888)	14.9368 *** (48.8372)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8.4768 *** (96.1662)	18.5538 *** (95.7354)	17.7429 *** (57.0287)	18.7750 *** (72.1992)	18.8939 *** (71.8008)	15.0143 *** (37.0684)
N	3 002	2 870	1 682	1 796	1 687	1 093
adj. R ²	0.1459	0.1913	0.4282	0.1841	0.2508	0.2242

分析表9可以发现,对于无政企关联的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对企业总贷款(lnal)、短期贷款(lnsl)和长期贷款(lnll)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无政企关联的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有助于获得更多贷款。对于有政企关联的企业来说,开展党建工作也能够为企业获得贷款带来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对比两类企业的*did*系数值可以发现,无政企关联企业的被解释变量系数均大于有政企关联企业的系数,这一方面说明开展党建工作对于缓解无政治关联企业的融资约束更为明显,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另一方面,这一结论也能够启发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主,应当转变思想,提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切实做好党建工作,努力发挥党建工作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重要作用,实现企业与党建工作的互促双强。

(2) 基于非上市企业的检验

为了提高数据的可得性和保证数据的质量,前文均以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诚然,上市企业本身融资能力已然较强,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也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自主选择,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对其获得更多贷款可能仅仅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对于众多的非上市中小微企业而言,在其自身生存都难以保障的前提下,开展党建工作的主观能动性或客观条件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约束。我们不得不思考,如果这些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对其缓解融资约束能否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为此,我们使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考察未上市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对融资约束的影响。CPES 问卷中虽然涉及企业有无党组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询问何时建立党组织,并且由于没有披露企业名称,后续很难通过调查手段进行补充。考虑到其数据特性,我们难以使用 DID 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选取 2012 年 CPES 调查数据和 2014 年 CPES 调查数据,采用分年度截面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 2012 年和 2014 年两个时间点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考虑到调查数据的时效性和详实性,2012 年和 2014 年两次调查数据是我们能获得的最新数据;二是 2012 年调查数据基本涵盖了党的十八大前的企业党建信息和经营特征,2014 年的调查数据则涵盖了党的十八大后的企业党建信息和经营特征。通过单一时点的截面回归可以得到有无党组织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通过对比两个时点的回归结果差异可以评价党的十八大前后开展党建工作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时间特征,这样可以间接得到类似于 DID 分析的效果。

在数据选取上,CPES 与企业贷款相关的数据主要包括流动资金中的贷款占比(*ltr*)、生产资金中的贷款占比(*plr*)、股份制银行贷款规模(*bbl*)和小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sbl*)。虽然这些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难以直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但是一定程度上能够表示企业可用贷款规模和贷款的可得性。对于核心解释变量,CPES 问卷中涉及“企业有无党组织”的问题,我们将这一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party*)。在控制变量上,由于 CPES 文本数据较多,为避免虚拟变量过多产生的共线性问题,我们从企业主体层面和企业层面选取了企业主有无政府职务(*gov*)、职工薪酬(*wage*)、平均贷款年息(*intrt*)、年营业收入(*income*)、年净利润(*profits*)、资产负债率(*debt*)六个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有无党组织”均对被解释变量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除 2012 年“生产资金中的贷款占比”外,均具有较好的显著性。分析表 10,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对于非上市私营企业而言,有无党组织会对企业贷款有显著的影响,表现为有党组织的企业可用贷款和贷款的可得性都有显著提升,说明开展党建工作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二是对比 2014 年与 2012 年两个时间点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party* 的系数值与显著性水平明显提高,这从侧面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三是对于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开展党建工作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小型金融机构层面都能使企业获得更多可用资金,这对于激励企业积极开展党建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同时,考虑到小型金融机构在企业融资中仍具有比较优势,继续规范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不失为缓解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

表 10 基于 CPES 非上市企业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

变量	2014 年				2012 年			
	<i>litr</i>	<i>plr</i>	<i>bbl</i>	<i>sbl</i>	<i>litr</i>	<i>plr</i>	<i>bbl</i>	<i>sbl</i>
<i>party</i>	0.1171 ** (2.3759)	0.1136 * (1.9076)	0.1664 ** (2.0664)	0.4178 ** (2.4475)	0.0864 * (1.5167)	-0.0141 (-0.2004)	0.3176 *** (3.2041)	0.3568 * (1.6861)
<i>gov</i>	-0.0470 (-0.9167)	0.0131 (0.2168)	-0.0173 (-0.2070)	-0.1687 (-1.1662)	-0.0077 (-0.1278)	0.1103 (1.4653)	0.1849 * (1.7989)	0.0659 (0.2526)
<i>wage</i>	-0.0546 ** (-2.2128)	-0.0372 (-1.2328)	0.1103 *** (2.7470)	0.0541 (0.6472)	-0.0082 (-0.3196)	-0.0150 (-0.4359)	0.2516 *** (5.6070)	0.0614 (0.6013)
<i>inrt</i>	0.0004 (0.3533)	0.0008 (0.6099)	0.0013 (0.6271)	0.0252 ** (2.1221)	0.0051 (1.5638)	0.0068 * (1.6580)	0.0001 (0.0234)	0.0093 (0.2912)
<i>income</i>	0.0193 (0.8174)	-0.0181 (-0.6265)	0.4931 *** (12.9316)	0.3382 *** (4.4528)	-0.0105 (-0.4484)	0.0253 (0.8514)	0.3751 *** (9.3789)	0.3732 *** (3.8413)
<i>profits</i>	-0.0001 (-0.0067)	0.0314 (1.5173)	0.1539 *** (5.5976)	0.0146 (0.2786)	-0.0245 (-1.4036)	-0.0283 (-1.2562)	0.0756 ** (2.4723)	0.0707 (1.0243)
<i>debt</i>	0.0045 *** (6.5093)	0.0038 *** (4.9497)	0.0097 *** (8.2222)	0.0160 *** (4.8923)	0.0052 *** (5.0712)	0.0038 *** (2.8788)	0.0105 *** (5.9542)	0.0061 (1.4585)
常数项	3.4897 *** (14.5051)	3.4613 *** (12.2085)	0.7709 ** (1.9734)	2.5856 *** (3.4124)	3.4687 *** (15.5944)	3.1122 *** (11.2621)	0.6261 (1.6395)	1.4073 (1.6145)
N	970	691	1 023	240	650	414	702	151
adj. R^2	0.0460	0.0350	0.5527	0.3606	0.0450	0.0242	0.5686	0.3715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从最初的党小组，到后来的党支部，逐步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一直是重中之重。基层党组织处于党各项工作的第一线，同群众保持着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是党保持战斗力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作为党发展壮大的基石，只有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服务功能，才能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放到了“固本强基”的战略高度，不断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本文从融资约束视角，将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相结合，实证分析了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党建红利”，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表现为企业得到的贷款规模增加与贷款可得性提高。二是党建工作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为，开展党建工作能够为非公有制企业带来增信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其中，增信效应表现为开展党建工作能够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向外界传达企业经营稳定、注重责任担当的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外部信任度；资源配置效应表现为企业党组织发挥服务职能，使企业及时享有更多财政补贴、贷款优惠等政策红利。三是对无政企关联和有政企关联的企业分别进行回归发现，无政企关联的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更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基于非上市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还表明，有党组织的企业不但可以从小型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获得更多贷款。

以上从融资约束视角观察到的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党建红利”进一步说明，党中央构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正在起到应有的作用，基层党建将党的执政理念直接

落实到企业当中,成为企业与党中央沟通对话的桥梁。当前,随着企业基层党组织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职能转变,“党建红利”正在凸显。

因此,非公有制企业主应当认识到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带来切实的“党建红利”,党建是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在企业达到党建条件后,企业主应积极组建基层党组织,开展组织生活,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先进理论,把握时代脉搏。进而在企业中凝聚向心力、战斗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企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

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无论是企业基层党组织还是各级党委组织部门,都要把党建工作转化为非公有制企业自身事业来抓,强调企业对党建的主观认同。只有不断让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才能实现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的双赢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在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有形覆盖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不断优化细化企业党组织的嵌入方式,将企业与党组织间的关系由依附性的浅层嵌入向内涵式的深度融合转变,在提高企业主党建主观意愿的基础上实现柔性嵌入,从而真正做到党组织与企业组织的融合,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主体,进而不断巩固党对非公有制企业的领导,实现党组织的有效覆盖。在政策咨询、激励监督、开展职工思想教育和激发员工活力等环节中起到建设性作用,发挥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利益聚合与协调功能,使党建工作成为企业对外联络的组织网络、信任基础和信息渠道。

参考文献:

- 1.陈仕华、卢昌崇,2014:《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管理世界》第5期。
- 2.戴亦一、余威、宁博、潘越,2017:《民营企业董事长的党员身份与公司财务违规》,《会计研究》第6期。
- 3.董志强、魏下海,2018:《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积极作用——以职工权益保护为例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动态》第1期。
- 4.苟琴、黄益平、刘晓光,2014:《银行信贷配置真的存在所有制歧视吗?》,《管理世界》第1期。
- 5.何轩、马骏,2016:《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第5期。
- 6.何轩、马骏,2018:《党建也是生产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7.景麟德、李金城、顾国达,2018:《信贷所有制歧视——政企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中国经济问题》第3期。
- 8.李宏亮、谢建国,2020:《高管政治身份影响民营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6期。
- 9.李健、郭薇,2017:《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理解社会组织党建的微观视角》,《探索》第5期。
- 10.李明辉、程海艳,2020:《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经济评论》第5期。
- 11.李世刚、章卫东,2018:《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的作用探讨》,《审计研究》第4期。
- 12.李姝、谢晓嫣,2014:《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企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第6期。
- 13.李文贵、余明桂,2012:《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14.吕劲松,2015:《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思考》,《金融研究》第11期。
- 15.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2012:《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 16.毛志宏、魏延鹏,2020:《党组织嵌入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来自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软科学》第8期。

17. 彭勃、邵春霞, 2012:《组织嵌入与功能调适:执政党基层组织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18. 蒲勇健、韦琦, 2020:《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软科学》第8期。
19. 邱斌建、付佳迪, 2016:《从“戴红帽子”到“多元主体共治”:非公党建中企业家的行动逻辑》,《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
20. 屈文洲、谢雅璐、叶玉妹, 2011:《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6期。
21. 王舒扬、吴蕊、高旭东、李晓华, 2019:《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经济管理》第8期。
22. 严斌剑、万安泽, 2020:《党组织设立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党政研究》第2期。
23. 余澳、贾卓强、张伟科, 2020:《总经理变更类型对国有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于来源渠道和产生方式的交叉视角》,《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24. 余汉、杨中仑、宋增基, 2017:《国有股权、政企关联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管理评论》第4期。
25. 郑长忠, 2019:《党建工作与非公企业有机融合的逻辑、空间与机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1期。
26. Amit, R., and P. J. H. Schoemaker. 1993. "Strategic Asset and Organizational R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4(1):33-46.
27. Cohen, D. A., A. Dey, and T. Z. Ly. 2013.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and Executive Incentives: Implications for Investments and Risk Taking."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0(4):1296-1332.
28. Hadlock, C. J., and J. R. Pierce. 2010.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3(5):1909-1940.
29. Kim, Y., M. S. Park, and B. Wier. 2012. "Is Earnings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7(3):1-53.
30. Whited, T. M., and G. Wu. 2006. "Financial Constraints Risk."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2):531-559.

Bonus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Non-public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Yin Zhichao, Peng Hongfeng, Xiao Zumian and Wang Ying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mproving Party construction of non-public enterpris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further advancing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is paper finds the "Party construction bonus" of non-public enterprises, that is, carrying out party building work helps enterprises to obtain more loans. There are two theoretical mechanisms. One is that the "credit enhancement effect" alleviates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the other is tha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enables enterprises to enjoy more policy benefits. In addition, for the enterprises without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helps alleviate financing discrimination of banks against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subjective identity and enthusiasm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non-public enterprises, and helps to realize the flexible embed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Keywords: Non-public Enterpris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Party Construction Bonus

JEL Classification: G38, L53, P48

(责任编辑:彭爽)